

茶座

总第十四辑 2008 第四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葛剑雄：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王春瑜：苍龙日暮还行雨——忆蔡尚思先生

蔡登山：蒋廷黻的婚姻悲剧

聂作平：书呆子改革家

郑会欣：蒋介石日记中的香港受降

散木：“文革”中的“伪照片”举隅

虞云国：宋代的叫卖声

胡发贵：中国古代的“执手”礼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学家茶座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IV | 历史学家茶座**14**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4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09-04644-2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0868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E-mail: lishixuejiachazuo@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时势”与“英雄” 秦晖

人们的生存状态是有好坏之分的,好坏之分是有普世标准的。尽管这些标准有多元、相对的一面。例如,一个技术先进的时代可能有野蛮的制度,一个战乱不已的时代可能“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文化上群星灿烂。而对一些事情的评价会有因文化与传统而异的不同,例如,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但不少蒙古征服的受害民族却把他视为屠夫。但是最基本的人文价值还是应该有普适性,我们据以将不同的状态分别称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都未尝不可。

历史学就是要研究这些不同状态之间的演变。但是实证的历史表明,所谓“落后”变“先进”、“野蛮”变“文明”的“必然性”或者“客观规律”并不存在。无论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全人类“必然”进步的“普遍规律”,还是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某个族群“必然”进步或者“必然”落后,都是无法证明的臆说。

因此,历史的本质是非决定论的。人们的状态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这取决于人们的选择和努力。但是这些选择和努力也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在时间上,某些关键点即重大历史契机时期的选择比一般时期的选择更为重要,在选择主体上,某些人的选择对其他人的命运有更大的影响。而且这两种情况还往往互相影响,形成“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这两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而历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时势”与“英雄”展开的。

在我看来,进步的历史观比起陈腐的历史观,只不过是不再把成为“英雄”的资格看成某些特殊个人的先天特权,而是把“英雄”看做时势与个人的努力的结果。陈腐的历史观相信某些人一生下来就“天纵英明”,而英明的主要表现是有权有势能够役使他人,而我们现在相信成为英雄的机会是向努力的人们开放的,而且英雄应该有益于公众,这并不必然与权势挂钩。杰出的帝王固然是英雄,但像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作为英雄的资格绝不亚于前者。

目录

卷首语

- 003 秦 晖 “时势”与“英雄”

学坛述往

- 007 潘光哲 为什么是史语所的“拒绝往来户”？
011 陆 远 趋时为先：从“同槽”看 20 世纪 50 年代的学术气候
——“八马同槽”与 20 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三）
018 谢本书 翦伯赞的“钉子”与黎澍的“苗子”
026 王春瑜 苍龙日暮还行雨——忆蔡尚思先生
031 彭林祥 1933 年丁玲被捕之后

人物春秋

- 036 吴振清 道光帝初政查“陋规”
041 聂作平 书呆子改革家
050 蔡登山 蒋廷黻的婚姻悲剧

公私档案

- 057 郑会欣 蒋介石日记中的香港受降

- 064 辛德勇 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073 散 木 “文革”中的“伪照片”举隅
085 姜庆刚 殷孟伦先生的一封还书函

读史偶记

- 087 安作璋 儒学与东亚文化
090 虞云国 宋代的叫卖声
099 王子今 “造反”的词汇史
105 杜泽逊 《甲骨学一百年》求疵

域外新知

- 109 欧阳哲生 柏林的汉学圈

历史现场

- 115 葛剑雄 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122 陈启能 《世界历史》初创记
134 彭小瑜 与北大世界史专业同行 30 年
142 马 军 吴国桢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回忆

掌故钩沉

- 145 胡发贵 中国古代的“执手”礼
150 王 昊 彩票在近代中国的兴衰
155 陆其国 中国近代史上的惊“天”之骗



100

101

102

103

104

为什么是史语所的“拒绝往来户”？

潘光哲*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世襄老人突然成为中国文化界的“当红炸子鸡”。除了他自己笔耕口述不辍之外，关于他的各种报道访问，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用“Google”检索，竟多达7,950项，令人咋舌。

在这些相关网页资料里，当然免不了王世襄生命史的回首述说。固然，前辈耆宿回顾自身筚路蓝缕的心路历程，后生小子绍述先贤发凡起例的行旅脚步，确实意蕴无限。只是，以个人的生命际遇来认识历史，固可见微知著，有时则难免“以管窥天”，恐怕“见树不见林”。王世襄老人对一代史学领航人傅斯年的回忆述说，就是个例子。

王世襄回忆，1943年冬天的时候，他想进傅斯年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工作，经由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一代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的介绍，得以拜见傅斯年。两人见面，傅斯年首先问王世襄：“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王答曰：他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毕业的。没想到，傅的回应居然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工作。”王世襄只得赧颜而退。（王世襄：《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文汇报》2006年7月5日，转引自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史林》2007年第3期。）

王世襄老人这番回忆的“可信度”，或许毋庸置疑。不过，只要仔细盘点一下

* 潘光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傅斯年那番“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工作”的述说,应该只是搪塞王世襄的遁词,绝对不是历史事实。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而扬名史坛的周一良(1913~2001年),就是不折不扣的“燕大人”。经由陈寅恪的推荐,连燕京大学研究院都还没毕业的周一良,在1936年进入史语所任职,学术事业起步于斯。周一良得与陈寅恪结缘,则有赖于同样都是“燕大人”,一样都曾任职史语所的俞大纲的牵线;至于另一位为史语所的重要学术业绩——校勘《明实录》而殉职的李晋华(?~1936年),也是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这样说来,“燕京大学毕业的”,绝对不是史语所招募新血的“拒绝往来户”。傅斯年拒绝王世襄的理由,其实不成理由。王世襄会在傅斯年那里吃了“闭门羹”,原因大概出在他自己身上。

王世襄老人回顾自己的生命行程,尝自嘲曰: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放飞,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还说自己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的时候,甚至于做出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在名教授邓之诚的课堂上,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濯心草堂札记·人物侧写:大玩家王世襄》)。青年王世襄的这等“玩家”派头,搁到现在固然是逸事佳话,当年却恐怕很难得到学界前辈的青睐;可以说,这幅“玩主”姿态,根本不合乎傅斯年对史学新秀的期望。

就以1931年9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公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度)》为例,这份文献的落款为“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唯从其间表达的思想来看,它实应为傅斯年的“代笔”之作。在这篇文献里,傅斯年主张大学历史系的专业教育,应该要能够让学生接受“严整的训练”,掌握“充分的工具”,最后能够“向史学的正轨‘步步登天’”。傅斯年指出,“所谓严

整的训练者,指脚踏实地不取转手的训练而言”,因此,就“史学的研求”而言,史学系的学生应该“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应该要“向教员受戒律,而取得三宝的——史学中的典笈,接近史料的工具,整理史料的方法”。同时,学生应该要能掌握如目录学和各种语言等等“充分的工具”,开展史学的研究。所以,接受史学专业教育的学生,就应该

脱去享受现成的架子,离开心思手足都不转动的稳椅,抛弃浮动浅陋的态度,而向史学的正轨“步步登天”。史学的步次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取得史实者,乃是史学中的学人,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引自尚小明:《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显然,在傅斯年的心目中,要能够“亲切的研习史籍”,“精勤的聚比史料”,“严整的辨析史实”,终而可以“取得史实”的,才有列为“史学中的学人”的资格。那么,在傅斯年主持之下的史语所要招募后起之秀,灌注新血的时候,首先会考虑的对象,自然就是在这些方面已然交出成绩单的青年才俊。

就以周一良为例。还只是燕京大学本科生的周一良,修习邓之诚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程之后,由于邓之诚打成绩,从不闭卷考试,只要求写论文,他就以《魏收之史学》一文为应。这是周一良“头一次写历史论文”,啼声初试,却是“一鸣惊人”。他的这篇文章不仅刊诸《燕京学报》(1935年);四十余年后,我国台湾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大师级前辈杜维运教授偕同弟子黄进兴教授合作编辑《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精选汇集史学史研究的名家论著为一编,不仅便利后学研究征引,更可一窥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轨迹;周一良这篇论文便是入选斯编的佳作之一。可以想见,风华正茂的周一良,彼时学术研究的业绩和贡献,深具超越时空限制的价值。陈寅恪会对周一良青睐有加,推荐他成为史语所研究团队的一员,其来有自。进入史语所之后,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依复耕耘不辍,撰文所得,也令前辈赞誉不已,如他的《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

府对待之政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6年),就深得陈寅恪欣赏,盖陈寅恪早就关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每当读书的时候“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等到读了周一良此文,陈寅恪不免感慨系之,自己“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又,陈寅恪的这段话,不见于他的文稿合集《金明馆丛稿初编》)。显然,周一良进入史语所之后的工作表现,不曾辜负推荐人的期许。

身为史语所的领导者,傅斯年对史语所如何引进栽培人才新血,自有想法;即使是他敬重的同辈学人推荐的新秀俊彦,也未必“照单全收”。像是陈寅恪在1933年即曾推荐过张荫麟(1905~1942年),称誉他是“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认为张荫麟“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正是“担任中国通史课”的最佳人选,所以,“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不过,“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陈寅恪甚至说他的荐贤之举“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他绝对“敢书具保证”。傅斯年向来敬重陈寅恪,但是对他“拍胸脯”保证推荐的张荫麟,傅居然没说“YES”,反而回答说:“此事现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然北大已竭力聘请之矣”,未曾想方设法把张荫麟拉进史语所来(最后,张荫麟既未进北大教书,也不曾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反倒回了清华)。傅斯年固然对梁思成、思永兄弟敬重有加,不过,就像他会拒绝了陈寅恪所推荐的张荫麟一般,傅对梁氏兄弟介绍的后起青年,自然不见得一定会一口答应。可以说,傅斯年为史语所挑选秀异新血的时候,不是看谁是他的推荐保证人,不是看他 是哪所学校毕业的,而是看这位青年自己的“本事”。例如,严耕望是“毛遂自荐”,自己写信给傅斯年,还另附上了自己三篇的研究成果,要求进入史语所的。显然,严耕望的研究得到了傅的赏识,他迅速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加入了史语所的队伍,此后潜心于学,成为中国制度史和历史地理等领域的大家之一。

傅斯年将“成就少年学者”当做史语所的重要责任之一;可是,谁是值得“成就”的“少年学者”,首先要求的,便是新生代“反求诸己”,确实已然做出相当具体的业绩。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趋时为先:从“同槽”看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气候

陆远*

——“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三)

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学术机构领导权的控制到学术期刊经营权的掌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清算旧学术到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唯物史观派全方位确立了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权力、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具有巨大的干预、渗透和制约作用。在唯物史观史学主流地位逐步确立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一步步对学术话语进行渗透,史学研究逐步被纳入到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客观地讲,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八马”,虽然各有建树、各具风采,但尚不构成学术史考察的群体性样本,其作为一个群体反映出的转型时期学术思想更替的意义,是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同槽”的过程以及同槽以后学人际遇与思想的变化中逐步体现出来的。

赵俪生的夫人高昭一曾经用两个词对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山大学风作过概括:“不守旧”和“趋时”。这与后世学者所说的“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派却一跃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控制史坛数十年,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学术界边缘地带,几乎销声匿迹”,是同一个意思。所谓“不守旧”,指的是对史料考订这种“旧学术范式”的排斥与改造,而“趋时”则是对“新指导思想”的响应与发扬。尽管二者折射的是同一种思想转变过程,但前后之间仍存在微妙差异。

* 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抗战期间长达8年的停办,对山东大学学统的赓续影响甚大,但反过来却又令其文史学科有了“不守旧”的基础。抗战以后山大复校,赵太侗掌校的三年不过是一种过渡,所谓“旧”的史学研究传统根本无从形成。到1949年青岛解放,山东大学由军管会接管,赵太侗去职,特别是1950年华东大学与山大历史教学研究力量整合以后,山大历史系的“旧”已被完全荡涤。——在革故鼎新的时代,这种对“旧”的荡涤,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对“旧学人”、“旧观念”的改造,而这种翻天覆地的革新,却因为改造对象气质、禀性与经历的差异而带给他们各自不同的际遇:或者因为完全不能认同“新”而“宁折不弯”,或者积极主动的“除旧趋新”,而更多人则取折中路线而行。时为山大历史系教授的丁山、黄云眉与郑鹤声,就是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丁山之死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史学界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数十年来聚讼纷纭。而半个多世纪后再来看这段公案,纠缠于具体死因已没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则是透过其政治事件的本质去看个中的“思想对立”。丁山出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时期就是顾颉刚的同人,此后更成为中研院史语所的创所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丁氏就有两篇论文赫然在目,而他与山东大学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1933年。如此的学术经历与地位,在当时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根本无出其右者,所以,赵俪生对丁山的第一印象就是“学问上是一位唯我独尊者”。以如此学术地位却不在“八马”之列,本身就隐含着校方“不守旧”的价值取向。也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其弟子辈的行政领导杨向奎、董书业诸人时,既有学术上的绝对自负,又因政治包袱而有所畏惧,加之其“徽骆驼”的执拗性格,心情并不愉快。丁的早逝,于此也并非没有关系。

与丁山的际遇迥然相异,黄云眉在新时期却受到了极大的礼遇:1956年2月,黄云眉作为山东大学的6名先进工作者之一出席青岛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工作者会议,不久因杨向奎的调离,代理历史系主任。1959年7月,山东大学调整校务委员会,黄云眉更成为7人常委之一。同时,又担任山东大学人民公社委员会委员、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0年5月13日至22日,作为特邀代表,黄云眉参加了山东省文教战线群英会。1961年11月,担任新成立的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不久,又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1962年6月,担任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

与之相应的，是黄在主观上对新时代新思想的认同和趋进：1951年黄氏自华东人民革大入山东大学的当年，面对一派热火朝天的新气息，就自云“始信平生双眼窄，撑肠万卷一冬烘”。1959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重印的《古今伪书考补证》引言里，黄更是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新时代：“解放以还，学术研究，多方开展，皆以党所领导社会主义之薪求为弹力准绳。风气所激，不特新著如林，读者应接不暇。……斯诚过去万不能有之现象，华颠对此，殊感神往！”此后作诗歌颂人民公社、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荣入党、接受记者采访等等，无不显示黄作为旧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身心俱悦。而晚年的黄云眉在“文革”最高潮的波诡云谲之际，还能够安然在各级领导关心下完成煌煌8册的《明史考证》，与丁山的郁郁而终又何啻天壤？

“八马”之中，郑鹤声也是典型的“旧人”。赵俪生回忆1950年他自东北到青岛，途径济南时去看望王献唐，王嘱咐赵代为在山大历史系看望两位老友，其一是丁山，另一个就是郑鹤声。不过郑鹤声既没有黄云眉那样的备极尊荣，也不似丁山那样与新环境格格不入，他应对激烈动荡的思想革新，最大的原则是明哲自保：他放弃了此前几乎所有的学术专长，按照组织的要求重新开课，转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近代史研究；他也批判胡适，却无非是应景之作；他不公开发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上的歧见，但也不放弃自己的学术兴趣，其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20世纪中期中国内地变革之巨，足以令每一个“旧学人”都产生相当复杂的心理状态。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旧知识分子仍然对自己的学术抱有相当高的自信。1950年，顾颉刚在困苦之中被聘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与柳诒徵同事。20多年前叱咤史坛时，柳诒徵在顾的心目中是“旧人”，而倏忽之间，顾自己已经与柳一样，被归为“老派”，个中沧桑滋味，又岂是后人可以体味万一的？不过即便身处如是颓境，顾仍有雄心万丈的自许，他在给刘节的信里说：

我辈在今日固不合时宜，然百年之后，时代娇儿都尽，学术界中所纪念者匪异人任矣。每念清末有俞、孙，民初有章、王，已将清代学术引到作

结论的地步,而政治潮流,来势过猛,炫人眼目,失其正常,遂将此应获得之收成放下。我辈如能排万难而为之,则累累硕果接在掌握中矣。

直到1952年童书业、杨向奎在《文史哲》同时发表文章,批判“古史辨派”,顾颉刚能从相反的方向认识《古史辨》“影响思想界者伟矣”的学术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丁山的高傲自负。实际上,即使相对“趋时”的黄云眉、童书业辈,对已成形的“考证”式的学术理路仍秉持坚定的信心。黄云眉对其旧作,自认“终不当见弃于今日,而以已陈之刍狗视之”,因为在黄的心目中,“古籍真伪之辩,犹为今日董理大量文献工作中之首要课题也”。而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所遵循的依然是“考证”范式的理路。而童书业所说的“谁说我不懂史料,这简直对我是莫大侮辱。老实说,我过去搞过几十年的考据,我会不懂史料?几年之内我要拿出一百万字的考据文章来给你们看,那时候你们才知道我的真才实学”,或许是一时激愤而发,但是,在举国学习马列,理论至上的大氛围之下,把“不懂史料考据”的指责作为对自己“莫大的侮辱”,却确确实实是童学术价值取向的真实告白。

另一方面,大部分旧学人对于新政权有或多或少的好感与认同。新政权毕竟将形同散沙的四万万人民团结起来,收拾金瓯初成,使国家有了由贫弱转向强盛的基础,这是顾颉刚对新社会的基本态度,也代表了绝大部分学人的心声。而对于黄云眉、童书业这样自学成才,在旧社会不为主流接受,生活长期颠沛困苦的学者来说,他们对新政权的好感与赞颂则是由衷的。黄云眉在1951年观青岛满坡避暑旧筑,写下“说到当年余愤涌,吾民蕉萃若曹肥”的诗句,抒发对昔年切肤之痛的真感情;他在此后出版的著作中,每每提及新旧社会的两重天地,这与童书业至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所抱有的真诚信念一样,绝非虚矫之言。

一方面是难以脱离旧有的学术理路;另一方面则希望融入时代的滚滚洪流,在两种思绪对立而又交织之下,像顾颉刚那样虽然“不甘心做一个落后分子”,却每生望洋兴叹、力不从心之感的心境,在旧学人中极是正常。张维华说,当时“历史系的同事都在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自是时代所

趋,而出现类似于《文史哲》创刊号上郑鹤声发表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例如张政烺在《历史教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歌颂汉代铁官图的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却被翦伯赞抨击为非历史主义的典型;罗尔纲说曾国藩是“反革命的英雄”,也被指责为反人民、反革命。参见蒋海升:《从主流到边缘: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史料考订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也并不奇怪。在这“不守旧”的氛围之下掩盖的旧学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其实更有深思的必要。

如果说“不守旧”之中包含着旧学人在新旧思想间两相依违的无奈,那么“趋时”既反映了时代风气所向,也反映了学人对“新”的自觉趋进,同时也不乏学术发展内在理路和逻辑的影响。

“趋时”首先体现在学术机构领导人物的引领。“八马同槽”时代,擘画全局的是杨向奎。杨向奎的学术兴趣始终是偏于“空灵的理论研究”而非实证。1936年他不顾师命,离开北大匆匆赴日,也是觉得整理内阁大库档案与其学术兴趣所在和价值取向有很大的距离(同样是整理内阁大库的档案资料,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史语所的李晋华、李光焘从最基本的校勘做起,甚至三年之内不许发文章。而这样的工作在杨向奎看来,却并非正式的学术工作,两相比较,学术理路的分歧立现)。20世纪40年代,杨向奎与顾颉刚在成都齐鲁大学的分道扬镳,学术分歧之外,也隐含着政治思想的渐行渐远。此后不久,《西汉的经学与政治》一书出版,杨向奎毫不讳言是为了反驳顾氏“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伪造”的观点,而行文立意,已隐约可见重宏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考察“阶级”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特色的思维逻辑。此后,杨向奎“左倾”色彩日益浓厚,从内战后期杨在东北大学参加反对“反共、反苏”口号的教授会,到与丁山因为政治见解的歧异而交恶,再到在山东大学成为备受瞩目的第一个入党的老教授,杨在八马同槽的年代,已经完全成为进步教授的典型。在杨向奎的领导下,又加之校长华岗的影响尤其是时代风气所向,八马同槽下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以“趋时”为特色,并不出于意外。

“趋时”色彩同样浓厚,但学术轨迹不同的是赵俪生。自“一二·九”到延安,再到华北大学,赵是“八马”中唯一可称“根红苗正”者,与左派渊源极深。——

“一二·九”运动中,与北大、清华、燕京、北师的学运领袖陆平、姚依林、黄华、阎晨都有往还;抗战前期就到过延安;以后在华北大学,作为艾思奇的副手,赵俪生一度是“第四部”(也就是研究部)史学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这个以范文澜领衔,包括艾思奇、刘大年、荣孟源等人的群体,再加上华北大学的正副校长吴玉章、成仿吾,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统领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重要班底。赵的学术领路人嵇文甫,1926年就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堪与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李达、华岗、王亚南等比肩的唯物主义史学头面人物。赵俪生总结嵇氏的学术路径,说其“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见过大世面,又是搞哲学的,所以属于高明一路”。所谓“高明一路”,其实就是重理论、重思辨,约略近于“史观学派”。赵以后“学术路子很大”,重视理论先行,很大程度上是仿效嵇氏那样“宏阔的学术境界”,因而在“八马”之中,赵俪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熏染时间最久,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也最为自觉。不过另一方面,赵的家世(赵的伯父赵录绩是晚清末科进士,在山东学界颇有声名;叔父赵孝孟是陈垣故交;赵的堂嫂又是傅斯年之妹)与早年在清华的经历,使得他与民国史界主流人物有不少过从。而其“全心全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气质,却又导致其价值取向上的矛盾特性。赵俪生最终没有进入史学界领导机构的中枢,是这种矛盾特性使然;晚年的赵俪生既不能见容于以韦君宜为代表的“一二·九”左派学生群体,也不为杨联陞这样的学术本位的学者所接受,也是这种矛盾性的体现;当然,这种矛盾特性也促成为赵俪生晚年学术反思深度的增加。

处于“不守旧”与“趋时”谱系之间的,是童书业和张维华。童书业出于新旧社会生活境遇的强烈对比,从而对中共和马列主义产生极大的尊崇与信任,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运用马列主义学说进行历史研究,而当局则由于童“业务较好,在本市和本省史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目的,希望能发挥其学术天才为新社会服务。张维华也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此后去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改造学习”(黄云眉、郑鹤声都曾经在此学习),及至经院系调整进入山东大学,对马列主义与新政权的主导思想一直亦步亦趋,以至在讲述古代史时还将班超与雷锋相比。但在新时期,童书业和张维华因为各自的“历史问题”,一直战战兢兢、